

遵义会议——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深入学习“四史”
牢记初心使命

一、历史背景

（一）“左”倾思想严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军队100万人，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以五十万人重点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达中央根据地，把持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最初主张全面出击，御敌于革命根据地之外，以阵地战取代运动战和游击战，同优势的敌人死打硬拼，犯了冒险主义错误；进攻受到挫折后，他们又分散兵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犯了保守主义错误，使得红军处处被动，到处挨打，损失惨重。红军奋战一年，没能打退敌人的“围剿”，处于危险境地。

（二）广昌之战——中央苏区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4年1

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三）粉碎蒋介石四次“围剿”的军事战略对比

时 间	国民党兵力	中央红军兵力	领导人	红军对策	红军歼敌数
第一次（1930.11—1931.1）	10万	4万	毛泽东	避敌主力 诱敌深入 集中优势 各个击破	1.5万
第二次（1931.3—5月）	20万	3万			3万多
第三次（1931.7—9月）	30万	3万			3万多
第四次（1933.2—3月）	50万	7万	周恩来 朱德		3个师

由此可见：战争的胜负，关键不在于力量的对比，而是取决于正确的战略战术。

（四）湘江战役后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湘江惨胜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五）遵义会议召开前的三次会议

1. 1934年12月12日，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2. 1934年12月18日，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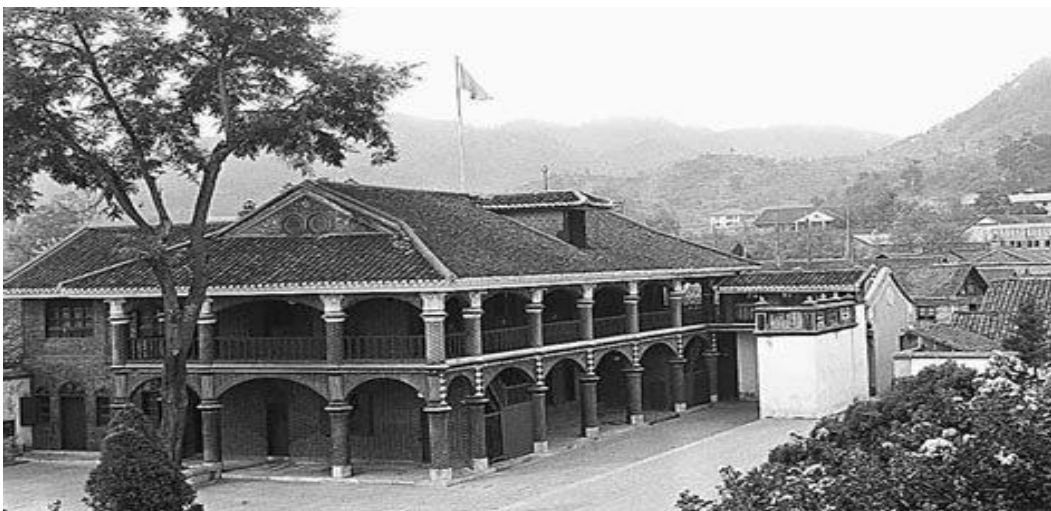
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3. 1934年12月31日，贵州猴场会议，会上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六）中央领导人对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

至此，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会议现场)

二、会议基本情况

(一) 时间：1935年1月15至1月17日

(二) 地点：贵州省遵义市（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三) 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

(四) 会议内容——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1.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2.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3. 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4.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5. 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遵义会议）

（五）会议决议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

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长征万里图之七

遵义曙光

三、历史意义

（一）翻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并在生死存亡考验中反复确立起来的基本经验，对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

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遵义会议既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

（三）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